

总 报 告



General Report

B. 1

中国经济转型与“十三五”展望

——2015 年经济形势与未来路径的选择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摘 要： 我国处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型时期，体制性问题所导致的纵向和横向分割以及人力资本的缺失，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2015 年及“十三五”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转型的关键时期，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投资增速的下滑、“干中学”效应的衰减以及需求结构的变化，是造成经济结构性减速的主要原因。预计 2015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 6.9%，在技术进步贡献率为 30% 的预期下，“十三五”时

* 本文执笔人为张平、袁富华、张自然、刘霞辉。参加讨论的人员有裴长洪、张连城、王宏森、吴延兵、赵志君、仲继垠、黄志刚、陈昌兵、张磊、张晓晶、常欣、田新民、汪红驹、汤铎铎、李成、郭路、王佳、张小溪、张鹏、陆明涛、辛超、李芳芳、赵阳。



期的总体增长速度可以勉强维持在6%。全要素生产率的增进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中之重，尤其要重视中西部地区生产效率的有效改进。因此，制度完善和人力资本培育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经济转型 “十三五” 区域 生产效率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呈现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特征。“三期叠加”效应导致企业利润下滑和地方政府债务不稳定、经济减速背景下产能过剩和生产部门通缩日趋严重，以及刺激政策形成的高负债率持续攀升，2014年全国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82%（麦肯锡，2015），这些压力直接传递到了2015年。2015年上半年经济仍处于减速的轨道，核心任务是稳增长，加快改革以推动经济转型，应对通缩机制的挑战，提高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2015年，中国积极为“十三五”时期的深层次改革、开发、开放夯基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自贸区”等区域开发已经启动；人民币资本项目有管理的开放步伐进一步加快。2015年宏观政策的频繁出台，主要围绕稳增长、加快全面开放和推动经济转型展开，但对传统体制“纵向”配置资源的改革进展较慢。一些制约经济转型的制度性障碍，如财税体制改革、政府行政体制转型有待消除，事业单位和公共服务部门、房地产登记和土地体制方面的改革有待突破。

以政策稳增长、以改革促转型、以布局谋发展是中国新常态的战略任务和机遇窗口，2015年及“十三五”是中国新常态、新转型的关键时期，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才能将开发、开放和宏观政策协调到创新驱动的新增长道路上来，这是“十三五”时期中国增长路径的重心。



一 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与预测

2015 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典型事实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减速，通缩由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下跌，演变为全国 GDP 平减指数下滑。GDP 平减指数第一季度转为 -1.2% ，全年预计为负值；通缩机制已经传导至投资、信贷和货币，并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个人收入预期不稳定。积极的因素是，相对于间接金融的收缩，资本市场在改革和开放中发展迅速，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股权融资体系，将中国的资产化率（股票市值占 GDP 比重）提升到了 80% 以上的水平；利率市场化与汇率国际化改革和开放的步伐加快，对经济转型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十三五”区域大布局更是奠定了中国未来发展之路。但是从短期来看，2015 年经济总体形势不容乐观，GDP 预计增长 6.9% ，基本能达到 7% 的计划增长目标。

（一）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

2015 年开局以来，政府全面推动改革与经济转型，一方面积极消化前期经济增长和政策激励累积下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积极推动股权市场、利率市场化、汇率国际化等金融要素的改革，以期通过金融体系改革推动经济转型。着眼于“十三五”开启了战略性区域布局，并号召全面创新创业，推动经济走内生性发展的道路。但转型过程仍面临巨大挑战，如全面通缩对经济健康发展的威胁，挑战与机遇并存是转型过渡时期的特点。

经验事实 1：全面通缩。持续 3 年的 PPI 下降已经引起了经济体的全面通缩，2015 年上半年 PPI 为 -4.6% ，GDP 平减指数为 -1.6% ，可以预计未来一个时期生产部门通缩将加剧，由于消费者物价指数也低于预期，GDP 平减指数更多地跟随 PPI 变化，2015 年 GDP 平减指数预计为 -1.4% ，预计全年处于通缩状态（见图 1）。

2015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进入通缩全面化，即以 GDP 平减指数衡量出现了负值，这是通缩机制通过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引起的。依据“金融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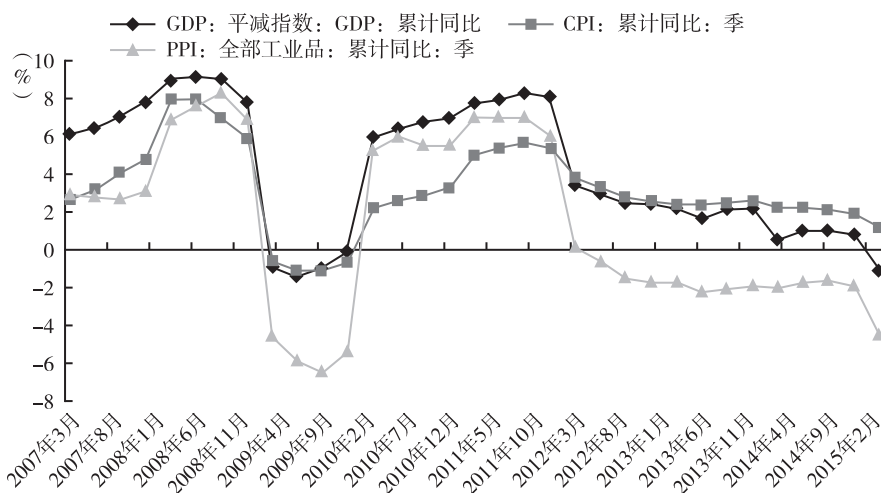


图1 2007~2015年各种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速”原理，微观主体通过市场是无法“出清”的，必然将实体经济的通缩引向整个经济体（张平，2015）。通缩机制自我加强的事实越来越清晰，银行坏账率上升，大量的货币投放难以进入实体经济，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进一步恶化，国家负债比率上升，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额增长过快，付息超过了GDP创造，中国仍难以降低杠杆率和实际利率水平，货币化程度、负债比仍在提高。

通缩机制从微观层面导致了非金融企业的盈利低于融资成本，而以前累积的高成本负债及高负债率直接降低了企业的净资本水平，抵押物价值下降，而且经济下行后又导致一些企业破产，银行坏账增加，促使银行更为审慎，银行收缩信贷，企业无利可图也不愿再投资，宁可作为放款人获取高的短期流动性回报。企业、地方政府、银行从盈利下滑到将资产下降，坏账增加，相互传染，导致投资、信贷、货币发行放缓，货币投放难以注入实体经济。按“金融加速”原理，通缩导致的失衡靠市场是难以收敛的，只有国家宏观政策的有效介入才能打破通缩机制，消除其负面作用。

经验事实2：地方债务置换。与通缩相对应的是中国税收收入增长缓

慢，中国的税收主体是增值税，其对生产价格非常敏感，对长生产链条、重资产公司的经营情况更敏感。从现有的通缩和重工企业的情况看，都是最不利于现有的流转税征收的。同样由于国内需求不畅，原材料进口迅速下降，关税也大幅度下降，而按 WTO 协定，2015 年下半年消费品关税将大幅度下调。与此同时，营改增全面铺开也是减税因素，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对所得税也有持续的影响。房地产的一蹶不振，导致地方的土地财政收入下降，2015 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同步下降，特别是地方财政困难加大，主要是原有的负债水平偏高，缺少收入来源，因此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变得脆弱（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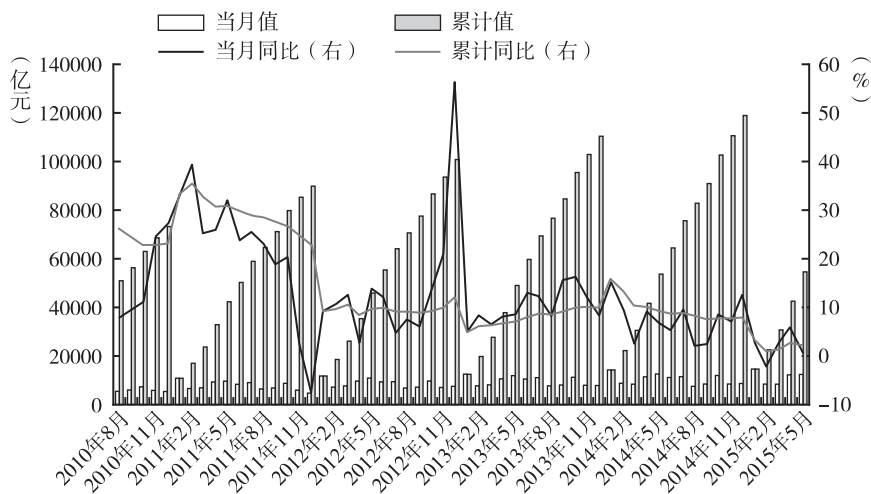


图 2 2010 ~ 2015 年税收收入及其变动状况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当前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而大量地方债务多使用地方融资平台方式进行融资，因利率水平高、期限短，地方政府难以为继。2015 年最为突出的政府举措是国家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对原有的地方债务进行替换，已经进行了 2 万亿元的地方债券替换。政府联合发文要求银行不能对地方在建项目停止贷款，以保证当前的在建投资。地方债务替换是 2015 年以来解决地方债务的重要举措，但似乎解决的主要是地方债务的流动性，对于大量的地方债



务置换降低债务成本帮助不大，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收入下降会继续累积新债务。

经验事实 3：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改革速度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利率按市场风险定价，这需要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银行等金融系统积极开启了多项改革，加强对刚性兑付的监管，如银行理财产品挂钩、出台信托监管条款、定义市场风险，最近又提高了存款利率的浮动利率幅度。特别是近年来的三大改革：①2015 年计划完成储蓄再保险制度；②出台大额存单制度；③国务院建议修改《银行法》，取消存贷比，改革银行负债结构，通道业务价值下降，市场利率更真实。这些都是在机制上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软约束下的地方政府和国企等负债问题、银行破产机制建立问题、银行监管问题等。应该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框架已经在 2015 年确立。

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支持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进程，人民币国际化涉及自由贸易区账户、沪港通、QDII2 等几个重要的方面，这些都探索了私人投资便利化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项目开放最后一类项目的开放测试已经基本完成。从时间上看，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加入 IMF 每 5 年一次评估 SDR 的前置条件，IMF 对人民币的评估表明，人民币现在处于正常估值状态，非常有利于成为 SDR。而且，人民币的汇率市场表现稳定，如果 2015 年底能实现有管理的资本项下开放，中国将有可能成为 SDR 的新成员，非常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如果难以完成或没有被认定，人民币国际化也会在 2016 年完成，因为届时中美双边投资谈判协定已完成，中国资本项下开放是双边协议的核心内容，因此可以说，2015 年是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和开放的奠基之年。

经验事实 4：资本化率跃升与多层次股权市场建立。中国经济信贷收缩，但股票市场崛起，资本化率（股票市值/GDP）从 2007 年的 150% 大幅度下降到 2013 年的 40%，之后又上升到 2015 年 6 月初的 90%，波动较大。资本化率是金融市场配置的一个重要指标，发达国家普遍在 80% 至 120% 之间波动（见图 3）。

中国资本市场化率提高的背后是多层次金融体系的建立，中国资本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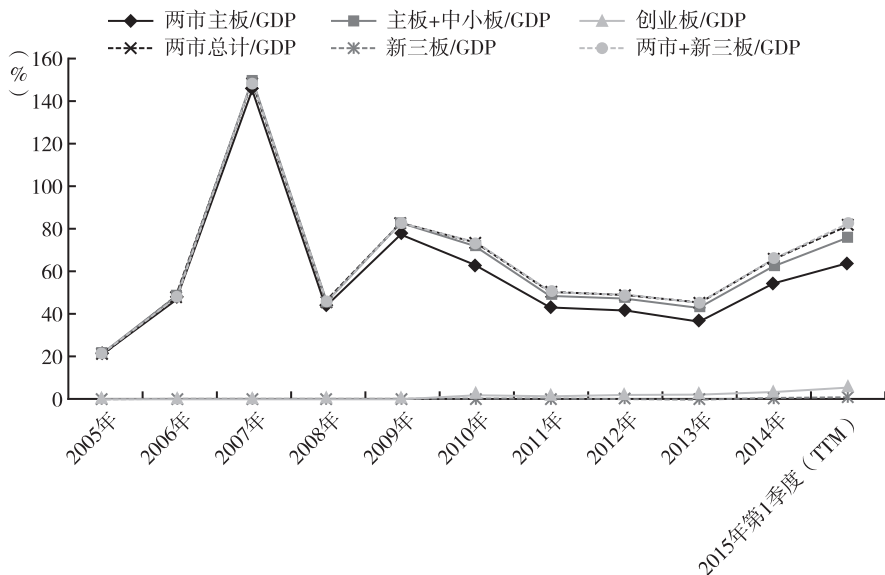


图3 2005~2015年中国资本市场结构状况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体系已经从主板市场扩展到了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地方产权交易，加上国际股票市场，最近又要开设新的市场，可以说中国股权融资的市场和多层次的变现生态体系已经建立，解决了创新型企业的融资问题。与国际比较，中国资本市场化率在现阶段来看已经不低了，但问题仍是波动非常大，要深化制度建设，将多层次的股权市场服务于企业创新（见表1）。

经验事实5：跨区域经济布局。2015年中国跨区域和“走出去”战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开发已经启动，自贸区从上海扩展到天津、广东和福建。此次区域布局最大的特征是跨区域协调发展，而且配合“走出去”战略，这是为稳增长与“十三五”国际化大格局发展奠定基础。此次跨区域经济布局涉及基础建设布局，以及市场规模一体化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在试图打破区划的分割，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而“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成为经济开放的典范，对国际地域发展合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表 1 资本化率的国际比较

年份	中国：上市公司 总市值：占 GDP 比重	资本市场：高收入 国家：上市公司总 市值：占 GDP 比重	资本市场：中低收入 国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占 GDP 比重	资本市场：中等偏上 收入国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占 GDP 比重	资本市场：中等偏下 收入国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占 GDP 比重	资本市场：中等收入 国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占 GDP 比重	单位： %
							资本市场：全球： 上市公司总市值： 占 GDP 比重
1991	0.53	56.48	18.64	20.30	13.29	18.86	51.21
1992	4.33	50.16	19.85	21.04	16.37	20.08	45.96
1993	9.22	61.99	34.70	36.65	28.56	35.07	58.02
1994	7.78	61.91	34.69	35.36	33.67	34.99	57.84
1995	5.78	66.49	31.41	31.73	31.63	31.70	61.05
1996	13.29	74.94	34.02	34.51	33.36	34.27	68.12
1997	21.66	88.08	30.52	32.91	22.75	30.81	77.72
1998	22.69	104.63	24.05	24.65	22.98	24.33	90.65
1999	30.53	132.28	39.40	41.47	34.31	39.95	117.26
2000	48.48	114.85	35.86	39.48	23.95	36.31	101.34
2001	39.55	100.13	33.10	36.80	20.57	33.45	88.48
2002	31.85	80.17	30.62	33.18	22.09	30.78	71.70
2003	41.51	96.51	40.14	43.24	31.29	40.59	86.66
2004	33.12	102.95	42.39	43.98	38.77	42.86	91.77
2005	34.59	104.42	45.19	45.04	47.81	45.67	93.69
2006	89.43	116.66	66.93	69.77	59.66	67.44	106.87
2007	178.20	116.98	109.83	114.62	98.16	110.77	115.46
2008	61.78	61.27	43.30	45.71	36.36	43.68	57.15
2009	100.35	85.05	70.67	75.67	55.97	71.36	81.50
2010	80.31	92.20	66.24	68.06	62.78	66.85	85.04
2011	46.29	75.07	43.95	44.97	41.58	44.22	66.06
2012	44.93	85.49	47.87	48.15	48.52	48.23	74.22

资料来源：国泰安数据库。

（二）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预测

2015年，大量的改革和发展措施为未来发展打开了空间，但短期的宏观走势是不容乐观的，通缩机制在不断地侵害经济实体（张平，2015）。针对经济减速和通缩的压力，2015年宏观政策连续推出了降准和降息，积极布局了跨区域发展的战略，推动了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地方债务置换，但2015年上半年的经济数据表明经济仍然偏弱，特别是汇丰PMI的6月指标仍在50以下，其分类指数中的就业项目收缩很快，显示出更深层的调整已开始。

根据GDP环比预测，2014年第四季度环比为1.4%，创了近5年的最低值纪录；而2015年第一季度环比仅为1.3%，第二季度环比也只有1.7%。据统计局最新数据，2015年上半年经济增长速度为7%，根据4个季度环比连乘的预测，如果第三季度环比上升与第二季度持平的话，2015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更低，全年预计只有6.9%的水平。经济增长减速来自企业和个人投资的下降。与此同时，政府支出受困于财政收入下降和地方债务压力加大，尽管消费较为平稳，但收入预期也在下降。贸易盈余更多地显示为衰退性的盈余，即进口大幅度下降导致的盈余，总体看经济疲弱趋势仍未改变。而金融市场建设和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推动转型，稳增长的宏观政策任务仍需加码（见表2）。

表2 2015年经济预测

主要经济指标	2014年	2015年预测
1. GDP实际增长率(同比,%)	7.4	6.9
2.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率(同比,%)	2	1.2
3. 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涨率(同比,%)	-1.9	-4.7
4. GDP平减指数(同比,%)	1.1	-1.4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同比,%)	12	10.4
6. 投资名义增长率(同比,%)	15.7	10.7
7. 贸易顺差(美元)	3829	4700
8. M2货币余额(同比,%)	12.2	10.4
9. M2/GDP(%)(2015年按预测值)	2.01	2.07
10. 资本化率(%)	0.67	0.8
11. 城市化率(%)	54.77	55.5



二 结构、转型与效率：“十三五”时期的 增长趋势（2016~2020年）

人口结构的变化、“干中学”技术进步贡献效应的递减，以及大规模工业化阶段的结束，迫使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结构性减速轨道。“十三五”时期，受结构性因素动态变化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减速趋势将更加显著，内生动力培育的要求将更为迫切。

（一）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给下降

人口结构转型及相应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是“二战”之后普遍呈现于世界各国的典型化事实，尽管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差别。WDI 数据显示，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高收入国家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由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年均增长 1.2% 下降到现阶段的 0.6%；类似的趋势也发生在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组，但其下降幅度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组。截至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仍处于 1.5%~2% 的水平。低收入国家组在 1960~2000 年经历了人口红利的加速上升，但 2000 年以来呈现向 S 形曲线顶部趋近的态势，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处于 2.5%~3% 的水平。从区域角度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人口转型尤为显著，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也面临快速下滑的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展，根本上受益于自身有利的人口结构，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与人口红利窗口正好重叠，而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减速与人口红利窗口的关闭密切相关。1985~2007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 1.58%，2008~2015 年下降到 0.61%，根据年龄移算，2016~2020 年将进一步下降到 -0.4%。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富裕人群闲暇追求倾向的增强，以及低龄劳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或劳动参与率也呈现越来越显著的下降趋势。例如，1985~2007 年中国劳动参与率增长幅度为 -0.07%，2008~2015 年为 -0.24%，



未来5年估计为 -0.50% 。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参与率增长速度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劳动力供给发生变化。中国劳动力投入增长率由1985~2007年的 1.5% ，下降到2008~2015年的 0.36% ，2016~2020年估计为 -0.9% 。

（二）经济发展阶段与资本投入变化

在工业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大规模投资行为赖以发生的基础有两个：一是廉价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工业投资扩张；二是交通运输等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两种投资相互补充，使得工业化时期的投资可以获得丰厚回报，投资意愿在这个时期也较为强烈。例如，1985~2007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年均 20% 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全社会资本形成率接近 40% 。同时，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为 11% ，人均资本的增长速度为 9.4% ，充分体现了资本驱动的工业化高增长方式。

2008年以来，有利于大规模工业投资的条件逐渐消失。随着中国人口转型的发生，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压低了投资回报，城市化时期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越来越倾向于生活便利，投资回报递减问题发生。同时，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也进一步压缩了投资回报的空间，因此削弱了民间投资意愿。从数据上看，2008年中国的高投资主要源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拉动，政府干预的色彩比以往更加浓厚。

但是，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一个基本判断是，经过20~30年的大规模开发，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高潮已经接近尾声。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超过 50% ，城市化开始向成熟时期迈进，工业、服务业资本积累速度将持续降低。根据城市化率与投资增长率的倒U形关系预测，2016~2020年中国资本存量增长速度将为 9.5% 。

（三）全要素生产率

在中国资本驱动的大规模工业化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系统的下降趋势，1985~2007年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接近 30% ，2008~2015年下降到 20% 以下。TFP贡献的这种系统性下降，是



中国低成本工业化模式使然。

从效率改进角度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依赖“干中学”而非内生的技术进步因素。以“耗竭”充裕的廉价劳动力禀赋而不是以“培育”人力资本来提升效率,是这种模式的特征。WDI 数据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力资本呈现典型的中等教育主导增长的特征,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受过高教育的劳动力比重均显著低下,这个问题成为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增长转型的主要障碍。

生产函数分解及趋势预测见表3。

表3 生产函数分解及趋势预测

项 目	历史(峰-峰: 1985~2007年)	现状(2008~ 2015年)	预测(2016~ 2020年)
[1]潜在增长(生产函数拟合)三因素(%)	10.10	8.54	6.20
[2]资本投入(K):弹性	0.6	0.6	0.5
[3]资本贡献份额 = $([2] \times [8]) / [1]$ (%)	68.72	82.20	76.60
[4]劳动投入(L):弹性	0.4	0.4	0.5
[5]劳动贡献份额 = $([4] \times [11]) / [1]$ (%)	6.17	1.69	-7.25
[6]TFP 增长率(%)	2.82	2.60	1.96
[7]TFP 贡献份额 = $100 - [3] - [5]$ (%)	27.94	16.16	30
因素细分			
[8]资本投入增长率($k = dK/K$) = $[9] \times [10]$ (%)	11.13	11.70	9.50
[9](净)投资率(I/Y) (%)	21.32	36.00	
[10]资本效率(Y/K)	0.52	0.34	
[11]劳动投入增长率($l = dL/L$) = $[12] + [13]$ (%)	1.50	0.36	-0.90
[12]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pop_l) (%)	1.58	0.61	-0.40
[13]劳动参与率变化率(θ_l) (%)	-0.07	-0.24	-0.50
[14]劳动生产率($y = Y/L$)增长率 = $[15] + [16]$ (%)	8.54	8.16	
[15]资本效率(Y/K)增长率(%)	-0.89	-4.19	
[16]人均资本(K/L)增长率(%)	9.43	12.35	
城市化			
[17]城市化率(%)	33	50.5	0.58

注:增长分解方法更加详细的论述请参见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论文(2012年、2013年、2014年)。



（四）产业结构变化与效率变动

要素结构和生产率的变化与产业结构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体趋势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变化，服务业以其高就业吸收能力日益成为城市化时期的主导部门。同时，鉴于中国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特征，劳动力和资本向服务业部门的集中，不可能取得像大规模工业化时期那样快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结构性减速是必然趋势。

如果说中国工业化阶段的效率增长拼的是规模和低成本的话，那么城市化阶段的效率维持拼的则是人力资本及相应创新。这时候生产创新和消费创新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产业结构变动仅仅依靠以往供给面因素驱动已经不可行，需求面的创新和多样化能力成为经济服务化时期的重要轮轴，但前提必须是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外部性在产业间、产业内联系中的增强。

根据我们的估算，1985 ~ 2007 年与 2008 ~ 2015 年两个时期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出现了下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也因此出现了下降。这验证了一种共识，即中国过去 30 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得益于大规模工业化的“干中学”和“投中学”效应，但是随着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形成，中国全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成为一种必然。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不能得到有效改善的前提下，我们预期“十三五”时期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还会持续降低到 8% 以下。

（五）2016 ~ 2020 年的潜在增长

通过对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见表 4）和生产函数的计算，得到“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大致维持在 6%，这里隐含了人口、劳动生产率、分配效应等多项假设。实际上，从中国经济近几年的表现看，很多情况都比我们的假设显得严重，实体经济低回报导致的投资增长下降、中等人力资本过多导致的创新路径阻塞以及服务业整体效率低下等，都有可能加剧经济结构性减速。



表 4 劳动生产率因素分解

项 目	历史(峰-峰: 1985~2007 年)	现状 (2008~2015 年)	预测 (2016~2020 年)
劳动生产率($y = Y/L$)增长率(%)	8.54	8.16	7.70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4.42	9.10	9.00
就业份额变动率(%)	-1.92	-4.33	-5.18
增加值份额	0.18	0.09	0.08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9.21	7.41	7.00
就业份额变动率(%)	1.35	1.18	1.00
增加值份额	0.49	0.49	0.45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5.99	5.00	5.00
就业份额变动率(%)	3.11	3.31	3.00
增加值份额	0.33	0.42	0.48
(参考指标——1978 年为基期):2013 年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8.1%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2.1%			

注:根据附录公式,劳动生产率($y = Y/L$)增长率 = 第一产业增加值份额 ×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第一产业就业份额变动率) + 第二产业增加值份额 ×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第二产业就业份额变动率) + 第三产业增加值份额 × (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 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变动率)。

三 区域发展状况及前景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近年来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态势。2014 年所有省份的 GDP 增长率低于 2013 年,从季度数据来看,2015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创出 7% 的新低,中国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速放缓,辽宁、山西、海南、黑龙江等省份 2015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低于 5%。PPI 连续 39 个月负增长,实体经济发展不容乐观,受转型的滞后影响,经济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

通过对 1990~2015 年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得出了中国 30 个省区市 1990~2015 年的发展前景指数与排名情况,以及经济增长、增长

可持续性、政府效率和人民生活 4 个一级指标的发展前景指数与排名情况。将各省区市 2000 ~ 2015 年、1990 ~ 2015 年、2015 年、2014 年、2013 年、2012 年、2011 年和 2010 年按权重比 3:3:2:1:1 分为五级，发展前景方面，上海市、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均处于第一级。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分级发生变化的省区市具体如下。第二级：内蒙古自治区从Ⅲ级上升到Ⅱ级，上升了一级。第三级：湖北省从Ⅱ级下降到Ⅲ级，下降了一级；湖南省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重庆市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第四级：河南省从Ⅲ级下降到Ⅳ级，下降了一级；山西省从Ⅲ级下降到Ⅳ级，下降了一级。

本文还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带和四大自贸区协调发展、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采取举措。经分析发现，排名前 5 位的发达省区市分属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前 5 个发达省区市中就有 3 个属于长三角地区，即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北京市属于京津冀地区，广东省属于珠三角地区。而四大自贸区分属 4 个省区市，即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和天津市，其中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也是发展前景排名前几位的省区市。本文同时对 5 个发达省区市的发展前景指标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各省区市发展前景2015年排名情况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各年份中国各省区市发展前景及一级指标排名、发展前景指数等。这里仅列出 2015 年各省区市发展前景及一级指标排名情况（见表 5）。

1. 2015年发展前景排名及权重

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发展前景排名上升的省份有 7 个：上升了 4 名的有 1 个，湖南省从第 20 名上升到第 16 名；上升了 3 名的有 1 个，重庆市从第 22 名上升到第 19 名；上升了 2 名的有 2 个，内蒙古自治区从第 13 名上升到第 11 名，河北省从第 23 名上升到第 21 名；上升了 1 名的有 3 个，四川省从第 18 名上升到第 17 名，陕西省从第 16 名上升到第 15 名，黑龙江省从第 14 名上升到第 13 名。



表 5 各省区市 2015 年发展前景及一级指标排名情况

地 区	综合	经济增长	增长可持续性	政府效率	人民生活
北 京	4	6	5	1	2
天 津	7	5	9	5	3
河 北	21	23	27	20	18
山 西	23	28	29	18	13
内蒙古	11	8	6	17	15
辽 宁	9	20	12	10	6
吉 林	10	15	13	16	8
黑龙江	13	19	11	9	21
上 海	1	2	1	2	1
江 苏	2	3	2	4	5
浙 江	3	4	3	3	4
安 徽	14	10	17	25	26
福 建	8	7	15	12	9
江 西	22	18	18	23	24
山 东	6	9	7	6	7
河 南	20	13	28	29	17
湖 北	12	12	19	13	12
湖 南	16	21	22	19	23
广 东	5	1	4	7	19
广 西	28	24	25	28	30
海 南	18	26	8	8	20
重 庆	19	14	21	14	29
四 川	17	16	16	22	16
贵 州	30	30	30	21	28
云 南	29	27	23	30	25
陕 西	15	11	20	24	11
甘 肃	27	17	26	27	27
青 海	26	29	14	15	14
宁 夏	24	22	24	11	22
新 疆	25	25	10	26	10

排名下降的省份有 6 个：下降了 4 名的有 1 个，山西省从第 19 名下降到第 23 名；下降了 3 名的有 2 个，海南省从第 15 名下降到第 18 名，河南

省从第 17 名下降到第 20 名；下降了 2 名的有 1 个，安徽省从第 12 名下降到第 14 名；下降了 1 名的有 2 个，湖北省从第 11 名下降到第 12 名，江西省从第 21 名下降到第 22 名。

其他省份 2015 年排名不变（见表 6、表 7）。

表 6 2015 年发展前景排名变化情况

发展前景	省 区 市
排名上升(共 7 个)	湖南省(+4)、重庆市(+3)、内蒙古自治区(+2)、河北省(+2)、四川省(+1)、陕西省(+1)、黑龙江省(+1)
排名不变(共 17 个)	青海省、甘肃省、北京市、天津市、辽宁省、吉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排名下降(共 6 个)	江西省(-1)、湖北省(-1)、安徽省(-2)、河南省(-3)、海南省(-3)、山西省(-4)

注：括号里面的加号表示排名上升，减号表示排名下降，下同。

表 7 2015 年发展前景排名变化及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北 京	4	4	0	7.22	河 南	17	20	-3	2.15
天 津	7	7	0	4.76	湖 北	11	12	-1	2.69
河 北	23	21	2	2.09	湖 南	20	16	4	2.34
山 西	19	23	-4	2.03	广 东	5	5	0	6.93
内 蒙 古	13	11	2	2.80	广 西	28	28	0	1.30
辽 宁	9	9	0	3.59	海 南	15	18	-3	2.29
吉 林	10	10	0	2.91	重 庆	22	19	3	2.19
黑 龙 江	14	13	1	2.67	四 川	18	17	1	2.32
上 海	1	1	0	8.78	贵 州	30	30	0	0.39
江 苏	2	2	0	8.41	云 南	29	29	0	0.74
浙 江	3	3	0	7.80	陕 西	16	15	1	2.34
安 徽	12	14	-2	2.50	甘 肃	27	27	0	1.53
福 建	8	8	0	4.01	青 海	26	26	0	1.65
江 西	21	22	-1	2.07	宁 夏	24	24	0	1.85
山 东	6	6	0	5.97	新 疆	25	25	0	1.68



2. 2015年经济增长排名及权重

和2014年相比,2015年经济增长排名上升的省份有13个:上升了7名的有2个,甘肃省从第24名上升到第17名,黑龙江省从第26名上升到第19名;上升了6名的有1个,宁夏回族自治区从第28名上升到第22名;上升了5名的有1个,内蒙古自治区从第13名上升到第8名;上升了3名的有2个,广西壮族自治区从第27名上升到第24名,云南省从第30名上升到第27名;上升了2名的有4个,湖北省从第14名上升到第12名,四川省从第18名上升到第16名,重庆市从第16名上升到第14名,河北省从第25名上升到第23名;上升了1名的有3个,安徽省从第11名上升到第10名,北京市从第7名上升到第6名,陕西省从第12名上升到第11名。

排名下降的省份有11个:下降了10名的有1个,辽宁省从第10名下降到第20名;下降了7名的有1个,山西省从第21名下降到第28名;下降了6名的有2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第19名下降到第25名,青海省从第23名下降到第29名;下降了4名的有2个,海南省从第22名下降到第26名,河南省从第9名下降到第13名;下降了1名的有5个,福建省从第6名下降到第7名,山东省从第8名下降到第9名,贵州省从第29名下降到第30名,湖南省从第20名下降到第21名,江西省从第17名下降到第18名。

其他省份2015年经济增长排名不变(见表8、表9)。

表8 2015年经济增长排名变化情况

经济增长	省 区 市
排名上升(共13个)	甘肃省(+7)、黑龙江省(+7)、宁夏回族自治区(+6)、内蒙古自治区(+5)、广西壮族自治区(+3)、云南省(+3)、湖北省(+2)、四川省(+2)、重庆市(+2)、河北省(+2)、安徽省(+1)、北京市(+1)、陕西省(+1)
排名不变(共6个)	吉林省、上海市、江苏省、天津市、浙江省、广东省
排名下降(共11个)	江西省(-1)、湖南省(-1)、贵州省(-1)、山东省(-1)、福建省(-1)、河南省(-4)、海南省(-4)、青海省(-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山西省(-7)、辽宁省(-10)

表9 2015年经济增长排名变化及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北 京	7	6	1	4.93	河 南	9	13	-4	3.19
天 津	5	5	0	5.84	湖 北	14	12	2	3.29
河 北	25	23	2	1.55	湖 南	20	21	-1	2.27
山 西	21	28	-7	1.16	广 东	1	1	0	9.16
内 蒙 古	13	8	5	4.47	广 西	27	24	3	1.53
辽 宁	10	20	-10	2.28	海 南	22	26	-4	1.32
吉 林	15	15	0	3.08	重 庆	16	14	2	3.11
黑 龙 江	26	19	7	2.33	四 川	18	16	2	3.00
上 海	2	2	0	8.68	贵 州	29	30	-1	0.62
江 苏	3	3	0	6.14	云 南	30	27	3	1.17
浙 江	4	4	0	5.99	陕 西	12	11	1	3.48
安 徽	11	10	1	3.61	甘 肃	24	17	7	2.51
福 建	6	7	-1	4.92	青 海	23	29	-6	0.77
江 西	17	18	-1	2.46	宁 夏	28	22	6	1.63
山 东	8	9	-1	4.17	新 疆	19	25	-6	1.35

3. 2015年增长可持续性排名及权重

和2014年相比，2015年增长可持续性排名上升的省份有10个：上升了6名的有1个，内蒙古自治区从第12名上升到第6名；上升了2名的有6个，江西省从第20名上升到第18名，浙江省从第5名上升到第3名，湖南省从第24名上升到第22名，宁夏回族自治区从第26名上升到第24名，山东省从第9名上升到第7名，湖北省从第21名上升到第19名；上升了1名的有3个，河北省从第28名上升到第27名，吉林省从第14名上升到第13名，河南省从第29名上升到第28名。

排名下降的省份有10个：下降了4名的有1个，辽宁省从第8名下降到第12名；下降了3名的有2个，广西壮族自治区从第22名下降到第25名，天津市从第6名下降到第9名；下降了2名的有4个，北京市从第3名下降到第5名，陕西省从第18名下降到第20名，重庆市从第19名下降到第21名，山西省从第27名下降到第29名；下降了1名的有3个，青海省



从第 13 名下降到第 14 名, 甘肃省从第 25 名下降到第 26 名, 海南省从第 7 名下降到第 8 名。

其他省份 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排名不变(见表 10、表 11)。

表 10 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排名变化情况

增长可持续性	省 区 市
排名上升(共 10 个)	内蒙古自治区(+6)、江西省(+2)、浙江省(+2)、湖南省(+2)、宁夏回族自治区(+2)、山东省(+2)、湖北省(+2)、河北省(+1)、吉林省(+1)、河南省(+1)
排名不变(共 10 个)	江苏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上海市、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黑龙江省
排名下降(共 10 个)	海南省(-1)、甘肃省(-1)、青海省(-1)、山西省(-2)、重庆市(-2)、陕西省(-2)、北京市(-2)、天津市(-3)、广西壮族自治区(-3)、辽宁省(-4)

表 11 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排名变化及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北 京	3	5	-2	6.43	河 南	29	28	1	0.86
天 津	6	9	-3	3.86	湖 北	21	19	2	1.89
河 北	28	27	1	0.89	湖 南	24	22	2	1.77
山 西	27	29	-2	0.67	广 东	4	4	0	7.10
内 蒙 古	12	6	6	4.01	广 西	22	25	-3	1.19
辽 宁	8	12	-4	3.82	海 南	7	8	-1	3.87
吉 林	14	13	1	3.59	重 庆	19	21	-2	1.77
黑 龙 江	11	11	0	3.83	四 川	16	16	0	3.08
上 海	1	1	0	11.11	贵 州	30	30	0	0.60
江 苏	2	2	0	7.58	云 南	23	23	0	1.66
浙 江	5	3	2	7.22	陕 西	18	20	-2	1.88
安 徽	17	17	0	2.20	甘 肃	25	26	-1	1.10
福 建	15	15	0	3.51	青 海	13	14	-1	3.57
江 西	20	18	2	1.89	宁 夏	26	24	2	1.23
山 东	9	7	2	3.95	新 疆	10	10	0	3.86

4. 2015 年政府效率排名及权重

和 2014 年相比, 2015 年政府效率排名上升的省份有 7 个: 上升了 1 名的有 7 个, 重庆市从第 15 名上升到第 14 名, 河北省从第 21 名上升到第 20

名, 黑龙江省从第 10 名上升到第 9 名, 山东省从第 7 名上升到第 6 名, 四川省从第 23 名上升到第 22 名, 贵州省从第 22 名上升到第 21 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第 27 名上升到第 26 名。

排名下降的省份有 5 个: 下降了 3 名的有 1 个, 江西省从第 20 名下降到第 23 名; 下降了 1 名的有 4 个, 青海省从第 14 名下降到第 15 名, 甘肃省从第 26 名下降到第 27 名, 广东省从第 6 名下降到第 7 名, 辽宁省从第 9 名下降到第 10 名。

其他省份 2015 年政府效率排名不变 (见表 12、表 13)。

表 12 2015 年政府效率排名变化情况

政府效率	省 区 市
排名上升(共 7 个)	重庆市(+1)、河北省(+1)、黑龙江省(+1)、山东省(+1)、四川省(+1)、贵州省(+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
排名不变(共 18 个)	山西省、安徽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海南省、云南省、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吉林省、河南省、湖南省
排名下降(共 5 个)	辽宁省(-1)、广东省(-1)、甘肃省(-1)、青海省(-1)、江西省(-3)

表 13 2015 年政府效率排名变化及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北 京	1	1	0	11.38	河 南	29	29	0	0.82
天 津	5	5	0	5.30	湖 北	13	13	0	2.86
河 北	21	20	1	1.97	湖 南	19	19	0	2.18
山 西	18	18	0	2.29	广 东	6	7	-1	4.93
内 蒙 古	17	17	0	2.31	广 西	28	28	0	1.00
辽 宁	9	10	-1	3.90	海 南	8	8	0	4.66
吉 林	16	16	0	2.48	重 庆	15	14	1	2.56
黑 龙 江	10	9	1	4.00	四 川	23	22	1	1.92
上 海	2	2	0	7.62	贵 州	22	21	1	1.95
江 苏	4	4	0	6.59	云 南	30	30	0	0.55
浙 江	3	3	0	7.48	陕 西	24	24	0	1.73
安 徽	25	25	0	1.27	甘 肃	26	27	-1	1.02
福 建	12	12	0	3.12	青 海	14	15	-1	2.54
江 西	20	23	-3	1.81	宁 夏	11	11	0	3.58
山 东	7	6	1	5.13	新 疆	27	26	1	1.05



5. 2015年人民生活排名及权重

和2014年相比,2015年人民生活排名上升的省份有8个:上升了4名的有1个,内蒙古自治区从第19名上升到第15名;上升了2名的有1个,四川省从第18名上升到第16名;上升了1名的有6个,云南省从第26名上升到第25名,宁夏回族自治区从第23名上升到第22名,福建省从第10名上升到第9名,海南省从第21名上升到第20名,湖南省从第24名上升到第23名,浙江省从第5名上升到第4名。

排名下降的省份有8个:下降了3名的有1个,河北省从第15名下降到第18名;下降了2名的有2个,广东省从第17名下降到第19名,江西省从第22名下降到第24名;下降了1名的有5个,黑龙江省从第20名下降到第21名,江苏省从第4名下降到第5名,安徽省从第25名下降到第26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第9名下降到第10名,河南省从第16名下降到第17名。

其他省份2015年人民生活排名不变(见表14、表15)。

表14 2015年人民生活排名变化情况

人民生活	省 区 市
排名上升(共8个)	内蒙古自治区(+4)、四川省(+2)、云南省(+1)、宁夏回族自治区(+1)、福建省(+1)、海南省(+1)、湖南省(+1)、浙江省(+1)
排名不变(共14个)	湖北省、陕西省、青海省、辽宁省、贵州省、天津市、北京市、上海市、吉林省、山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山西省、重庆市
排名下降(共8个)	河南省(-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安徽省(-1)、江苏省(-1)、黑龙江省(-1)、江西省(-2)、广东省(-2)、河北省(-3)

表15 2015年人民生活排名变化及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北 京	2	2	0	6.21	吉 林	8	8	0	4.17
天 津	3	3	0	6.14	黑 龙 江	20	21	-1	2.35
河 北	15	18	-3	2.93	上 海	1	1	0	8.00
山 西	13	13	0	3.64	江 苏	4	5	-1	5.33
内 蒙 古	19	15	4	3.06	浙 江	5	4	1	5.47
辽 宁	6	6	0	4.49	安 徽	25	26	-1	1.76

续表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地 区	2014 年	2015 年	2015 年 变化	权重
福 建	10	9	1	3.95	重 庆	29	29	0	1.13
江 西	22	24	-2	1.78	四 川	18	16	2	3.02
山 东	7	7	0	4.35	贵 州	28	28	0	1.43
河 南	16	17	-1	2.99	云 南	26	25	1	1.77
湖 北	12	12	0	3.66	陕 西	11	11	0	3.67
湖 南	24	23	1	1.83	甘 肃	27	27	0	1.47
广 东	17	19	-2	2.88	青 海	14	14	0	3.26
广 西	30	30	0	1.08	宁 夏	23	22	1	1.92
海 南	21	20	1	2.47	新 疆	9	10	-1	3.79

（二）各省区市发展前景2015年分级情况

1. 2015年各省区市发展前景分级

将 2015 年各省区市发展前景综合得分按权重比 3:3:2:1:1 分为五级，第一级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4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30%。第二级为广东省、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7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3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发展前景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从Ⅲ级上升到Ⅱ级，上升了一级。第三级为湖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陕西省、湖南省、四川省、海南省、重庆市，8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2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发展前景方面湖北省从Ⅱ级下降到Ⅲ级，下降了一级；湖南省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重庆市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第四级为河南省、河北省、江西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5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1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发展前景方面河南省从Ⅲ级下降到Ⅳ级，下降了一级；山西省从Ⅲ级下降到Ⅳ级，下降了一级。第五级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6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10%。

30 个省区市 2015 年发展前景的分级情况见表 16。



表 16 30 个省区市 2015 年发展前景等级划分

发展前景	省 区 市
I 级(共 4 个)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北京市
II 级(共 7 个)	广东省、山东省、天津市、福建省、辽宁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III 级(共 8 个)	湖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陕西省、湖南省、四川省、海南省、重庆市
IV 级(共 5 个)	河南省、河北省、江西省、山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V 级(共 6 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

2. 2015 年各省区市经济增长分级

将 2015 年各省区市经济增长综合得分按权重比 3:3:2:1:1 分为五级,第一级为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4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30%。第二级为天津市、北京市、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安徽省,6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3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经济增长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从Ⅲ级上升到Ⅱ级,上升了一级;安徽省从Ⅲ级上升到Ⅱ级,上升了一级。第三级为陕西省、湖北省、河南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甘肃省,7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2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经济增长方面河南省从Ⅱ级下降到Ⅲ级,下降了一级;四川省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甘肃省从Ⅴ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两级。第四级为江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湖南省,4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1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经济增长方面黑龙江省从Ⅴ级上升到Ⅳ级,上升了一级;辽宁省从Ⅱ级下降到Ⅳ级,下降了两级。第五级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云南省、山西省、青海省、贵州省,9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1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经济增长方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Ⅳ级下降到Ⅴ级,下降了一级(见表 17)。

3. 2015 年各省区市增长可持续性分级

将 2015 年各省区市增长可持续性综合得分按权重比 3:3:2:1:1 分为五级,第一级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4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3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方面浙江省从Ⅱ级上升到

表 17 30 个省区市 2015 年经济增长等级划分

经济增长	省 区 市
I 级(共 4 个)	广东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
II 级(共 6 个)	天津市、北京市、福建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安徽省
III 级(共 7 个)	陕西省、湖北省、河南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甘肃省
IV 级(共 4 个)	江西省、黑龙江省、辽宁省、湖南省
V 级(共 9 个)	宁夏回族自治区、河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南省、云南省、山西省、青海省、贵州省

I 级，上升了一级。第二级为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海南省、天津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7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3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方面北京市从 I 级下降到 II 级，下降了一级；内蒙古自治区从 III 级上升到 II 级，上升了一级；黑龙江省从 III 级上升到 II 级，上升了一级。第三级为辽宁省、吉林省、青海省、福建省、四川省、安徽省，6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2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方面辽宁省从 II 级下降到 III 级，下降了一级；安徽省从 IV 级上升到 III 级，上升了一级。第四级为江西省、湖北省、陕西省、重庆市、湖南省，5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10%。和 2014 年相比，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方面湖南省从 V 级上升到 IV 级，上升了一级。第五级为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贵州省，8 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 10%（见表 18）。

表 18 30 个省区市 2015 年增长可持续性等级划分

增长可持续性	省 区 市
I 级(共 4 个)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
II 级(共 7 个)	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山东省、海南省、天津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黑龙江省
III 级(共 6 个)	辽宁省、吉林省、青海省、福建省、四川省、安徽省
IV 级(共 5 个)	江西省、湖北省、陕西省、重庆市、湖南省
V 级(共 8 个)	云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甘肃省、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贵州省



4. 2015年各省区市政府效率分级

将2015年各省区市政府效率综合得分按权重比3:3:2:1:1分为五级,第一级为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4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30%。和2014年相比,2015年政府效率方面江苏省从Ⅱ级上升到Ⅰ级,上升了一级。第二级为天津市、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6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30%。和2014年相比,2015年政府效率方面黑龙江省从Ⅲ级上升到Ⅱ级,上升了一级。第三级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湖北省、重庆市、青海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7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20%。和2014年相比,2015年政府效率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第四级为山西省、湖南省、河北省、贵州省、四川省,5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10%。和2014年相比,2015年政府效率方面贵州省从Ⅴ级上升到Ⅳ级,上升了一级;四川省从Ⅴ级上升到Ⅳ级,上升了一级。第五级为江西省、陕西省、安徽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云南省,8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10%。和2014年相比,2015年政府效率方面江西省从Ⅳ级下降到Ⅴ级,下降了一级(见表19)。

表19 30个省区市2015年政府效率等级划分

政府效率	省 区 市
Ⅰ级(共4个)	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
Ⅱ级(共6个)	天津市、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
Ⅲ级(共7个)	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湖北省、重庆市、青海省、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
Ⅳ级(共5个)	山西省、湖南省、河北省、贵州省、四川省
Ⅴ级(共8个)	江西省、陕西省、安徽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云南省

5. 2015年各省区市人民生活分级

将2015年各省区市人民生活综合得分按权重比3:3:2:1:1分为五级,第一级为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江苏省,5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30%。和2014年相比,2015年人民生活方面浙江省从Ⅱ级上

升到Ⅰ级，上升了一级。第二级为辽宁省、山东省、吉林省、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省、湖北省、山西省，8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30%。和2014年相比，2015年人民生活方面湖北省从Ⅲ级上升到Ⅱ级，上升了一级；山西省从Ⅲ级上升到Ⅱ级，上升了一级。第三级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河南省、河北省、广东省，6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20%。和2014年相比，2015年人民生活方面内蒙古自治区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四川省从Ⅳ级上升到Ⅲ级，上升了一级。第四级为海南省、黑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省、江西省，5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10%。和2014年相比，2015年人民生活方面宁夏回族自治区从Ⅴ级上升到Ⅳ级，上升了一级；湖南省从Ⅴ级上升到Ⅳ级，上升了一级。第五级为云南省、安徽省、甘肃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6个省区市权重之和约占总权重的10%（见表20）。

表20 30个省区市2015年人民生活等级划分

人民生活	省 区 市
Ⅰ级(共5个)	上海市、北京市、天津市、浙江省、江苏省
Ⅱ级(共8个)	辽宁省、山东省、吉林省、福建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陕西省、湖北省、山西省
Ⅲ级(共6个)	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河南省、河北省、广东省
Ⅳ级(共5个)	海南省、黑龙江省、宁夏回族自治区、湖南省、江西省
Ⅴ级(共6个)	云南省、安徽省、甘肃省、贵州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

（三）发达地区增长绩效

下面从具体指标方面分析5个发达省区市在全国30个省区市中的地位。5个发达省区市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我们发现，5个发达省区市分属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其中，北京市属于京津冀地区，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属于长三角地区，广东省属于珠三角地区。而四大自贸区分属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和天津市4个省区市，其中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也是发展前景排名前几位的省区市。



1. 从产出效率来看

2015 年上海全要素生产率在 5 个发达省区市和 30 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 30 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 2，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2 位；上海排名第 1；江苏排名第 6，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7 位；浙江排名第 3，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 1 位；广东排名第 7，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1 位。

2015 年上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 5 个发达省区市和 30 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 30 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 11，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 1 位；上海排名第 1；江苏排名第 3，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1 位；浙江排名第 9，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2 位；广东排名第 5，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1 位。

2015 年广东资本产出率在 5 个发达省区市和 30 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 30 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 6，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3 位；上海排名第 2，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2 位；江苏排名第 3，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 1 位；浙江排名第 4，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 1 位；广东排名第 1。

2015 年上海投资效果系数在 5 个发达省区市和 30 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 30 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 5；上海排名第 1，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1 位；江苏排名第 4；浙江排名第 3；广东排名第 2，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 1 位。

2. 从经济结构来看

2015 年浙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5 个发达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 30 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 30；上海排名第 28；江苏排名第 20，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 2 位；浙江排名第 18，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1 位；广东排名第 21。

2015 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在 5 个发达省区市和 30 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 30 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 1；上海排名第 2；江苏排名第 14，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 6 位；浙江排名第 6，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 1 位；广东排名第 5。

2015 年上海城市化率在 5 个发达省区市和 30 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 30 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 2；上海排名第 1；江苏排名第 4；浙江排名第 7；

广东排名第6，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3. 从经济稳定来看

2015年广东经济增长波动率指标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7，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6位；上海排名第11，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7位；江苏排名第8，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浙江排名第22，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9位；广东排名第1，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5位。

2015年北京对外开放稳定性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1，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4位；上海排名第23；江苏排名第2，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浙江排名第10，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位；广东排名第5，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1位。

2015年江苏人均GDP增长率在5个发达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25，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5位；上海排名第14，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5位；江苏排名第5，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9位；浙江排名第6，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21位；广东排名第21，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3位。

2015年北京通货膨胀率指标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1，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26位；上海排名第30，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6位；江苏排名第24，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9位；浙江排名第22，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6位；广东排名第25，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3位。

2015年北京失业率指标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1；上海排名第29，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位；江苏排名第7，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浙江排名第6，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广东排名第3。

4. 从增长潜力来看

2015年江苏专利授权量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5；上海排名第6；江苏排名第1；浙江排名第



2,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 广东排名第3,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2015年上海地方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9,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上海排名第1; 江苏排名第3; 浙江排名第10,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 广东排名第13,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2015年上海人力资本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4,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3位; 上海排名第1,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2位; 江苏排名第6,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位; 浙江排名第12,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位; 广东排名第28,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4位。

2015年广东人口增长率在5个发达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12,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0位; 上海排名第30,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7位; 江苏排名第22,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3位; 浙江排名第27,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7位; 广东排名第7,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1位。

2015年上海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3,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上海排名第1; 江苏排名第2,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 浙江排名第5,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 广东排名第7。

2015年广东有效劳动力比例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13,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4位; 上海排名第18,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5位; 江苏排名第5,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浙江排名第19; 广东排名第1, 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

2015年上海人均邮电业务量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5,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上海排名第1; 江苏排名第6; 浙江排名第3; 广东排名第2。

5. 从公共服务效率来看

2015年江苏市场化程度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29, 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位; 上海排名第



14，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4位；江苏排名第1；浙江排名第2，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2位；广东排名第4，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

2015年广东城镇社区服务设施数在5个发达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3，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2位；上海排名第16，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江苏排名第5，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浙江排名第4，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广东排名第2。

2015年上海交通事故指标在5个发达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15，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4位；上海排名第3；江苏排名第27；浙江排名第28；广东排名第29，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

2015年浙江火灾事故指标在5个发达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23，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2位；上海排名第29；江苏排名第15，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6位；浙江排名第14，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6位；广东排名第28。

2015年广东反贪腐情况在5个发达省区市和30个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24；上海排名第19，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2位；江苏排名第4；浙江排名第18，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位；广东排名第1。

2015年江苏城市设施水平在5个发达省区市中排名最高。在30个省区市中北京排名第20，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上海排名第29；江苏排名第2，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1位；浙江排名第5，与上一年比较下降了2位；广东排名第13，与上一年比较上升了1位。

四 政策与“十三五”路径的选择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区域开发和深层次开放继续推进，为了应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制定的政策和采取的措施应该针对以下几方面的转型要求：第一，坚持创新和效率取向的城市化方式，稳固可持续增长的基础；第二，坚持“利益共同性”取向的秩序规范，



缓解经济矛盾及其压力；第三，坚持福利取向的增长方式重构，进行经济和社会的整合。这种要求决定了“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不同于以往的增长方式选择。

（一）清晰定位“两只手”，把政府职能逐步转到秩序规范 and 经济社会整合上来

市场“看不见的手”与政府“看得见的手”打架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常见矛盾。原因在于，为了实现快速资本积累和经济追赶，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过多参与经济事务，内生性政府因此具有强烈的经济利益导向，其经济社会“秩序规范者”的本质作用逐渐淡化。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政府的这种“亲资本”而非“亲秩序规范”倾向，表现为强制性的政府权力广泛渗透于经济体系，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控制和约束，资源配置和选择的市場决定性作用无法发挥，经济成本无法得到充分反映，效率改进路径受阻。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起决定作用的前提，首先应该是政府内生性作用的弱化，关键是强制性权力的退出。

根据具体经济条件的变化定位政府作用，是经济学的共识。出于增长促进目的，工业化快速积累阶段政府的“亲资本”特征导致了资源配置方式的偏倚，金融秩序、生产秩序、分配秩序的建立倾向于垄断和资本，结果是经济结构失衡和效率改进路径受阻，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不稳定性和内生性政府作用的不可持续性。解决这种矛盾的要求，是在“利益共同性”这一古典假设下政府职能的再定位，让政府“亲秩序规范”的作用得到发挥，建立有利于市场机制运作的外部环境，确立“看不见的手”的经济地位。

（二）防止规模效率模式向租金抽取模式退化，进行存量改革

中国经济结构性加速时期，规模效率模式的发生机制是，通过政府内生性干预和要素市场扭曲，在最大限度动员劳动力的基础上实现快速资本积累，并通过“干中学”提高生产效率；以选择性融资和部门、区域分割为基础建立工业化秩序，实现工业化大推进目的。在中国经济结构性减速的新



常态下，这种体制导致的问题是：纵向水平上国有经济依然保持信贷、技术的资源获取优势，市场竞争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深化水平较低；横向水平上科教文卫、社会管理等非生产性部门保持较强的规模扩张和人力资本集聚能力，但是不能给予生产性部门足够的效率补偿。在这种情况下，规模效率模式向抽租效应的退化开始显现，表现为：纵向水平上垄断力量施加于竞争经济部门的租金抽取；横向水平上非生产性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扩张对生产性部门形成的抽取效应（袁富华、张平、陆明涛，2015）。

纵向、横向条块分割是经济中“两只手”打架的具体表现，这种情境下的抽租效应与垄断和资源错配有关，相应的调整措施也主要集中于现实的制度存量方面。①改革庞大的行政、事业部门，释放生产性资源，为财政减压。据统计，中国每百万美元 GDP 的财政供应人口数是日本的 10 倍，分别是美国和德国的 5 倍多，中国因人设事的行政、事业体制占用了大量生产性资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围绕简政问题进行了七轮机构改革，但每一次都遭遇了强力反弹，机构越改越大，官员越改越多，权力越改越大。新常态下，机构改革已经不是简单地减人问题了，而是关系到经济增长潜力能否得到释放的问题。②纵向水平上的改革目标，是实现经济主体在资源选择和获取上的机会公平，削弱资本、技术的行政垄断力。需要整合国有经济，明确国有经济部门的技术创新功能，建立国有经济创新－成本评价模式，以国际市场技术竞争力作为评价标准。对于资金在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中的配置方式，要建立基于核心竞争力的信贷支持机制，把资源的可获得性作为奖励，投放给最有能力的部门和企业。

（三）把握要素再生产的动态变化特征，重视人力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工业化快速扩张阶段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来源于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人口红利，物质资本再生产是该阶段的特征。当人口红利耗尽及物质资本再生产速度放缓时，支持经济新常态的要素也相应发生变化，此时，物质资本再生产让位于人力资本再生产。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与“世界工厂”地位相匹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半熟练”工人，中等教育程度人力资本主导的规模效率模式，是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但是，这种人力资本状况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土壤，作为新知识生产和运用的创新机制，是与高级人力资本和熟练工人的广泛存在分不开的。因为，只有当高层次人力资本储备达到必要的厚度时，才有切实的转型基础。这种经验被转型成功的国家——典型的如韩国——的经济实践所印证（袁富华、张平、陆明涛，2015）。

根据人力资本培育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规律，即使从眼下着手，中国也需要至少10~20年的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时期，而后才能谈及切实的效率改进问题。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中国人口众多，短时期内不能实现像韩国、日本那样第三级人力资本的深化和广化。可行的路径在于对关键环节的把握，即R&D精英绝对数量的扩大、熟练技术工人规模的扩张，以及熟练工人职级晋升激励系统的建立。人力资本梯度升级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纠正日益凸显的人力资本错配问题。这种错配现象表现为第三级人力资本向非生产性部门的过度集中，在决定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流向上，政府垄断力量似乎比市场力量更强大。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第三级人力资本即使有较大规模的提高，也会因为错配而限制其生产效率和外部性，即所谓的人力资本的无效使用。为此，加快政府和事业单位用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打破人力资本市场分割和垄断，成为制度存量调整的关键。

（四）规范投融资秩序，建立效率改进的长效机制

工业化规模扩张时期，投融资秩序是围绕实现持续快速增长的目标建立起来的。这个阶段投融资秩序的特征是：国有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目的是方便政府通过选择性融资方式，把资金配置于战略性产业以实现规模效率；相应的，为了发挥选择性融资的大推进作用，利率通常被置于管制之下。同时，受管制的汇率也被置于增长目标之下，都是为了保证低成本工业化的顺利开展。



从物质资本来看，中国过多的资本进入政府主导的原料和重工业部门以及房地产和物质基础设施部门，造成突出的资本无效配置现象。这种依赖投资驱动的规模效率具有外生性和不可持续性，是导致新常态下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结构性减速时期，基于内生动力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成为重要议题。以投融资体系自身改革为基础，推动市场激励和创新长效机制建立，是内生性效率产生的重要路径。核心是加速推进金融体系转型，规范金融秩序，让微观主体在公平竞争环境中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激发创新活力；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改革，鼓励企业在全球获取创新资源和高收益的“硬资产”，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具体措施为：①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包括股权和固定收益市场，同时配合监管转型，促进资本市场效率提升；②加快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让风险与收益相匹配，提供人民币国际化投资的便利性，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投资效率并保证投资方式的多样性；③推动国内软预算部门的改革，特别是推动地方政府、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以及国企改革，让管制权力退出市场，拓展国内发展空间，即打掉“纵向”计划或行政分割的体制，转向依据市场配置资源的“横向”体制，以投融资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为核心确立“看不见的手”的地位。

（五）运用空间整合发掘报酬递增机会

首先，就国内空间整合而言，新常态下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和内生增长机制的建立，不仅要求打破条块分割体制，进行经济秩序的规范和重建，而且要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匹配，“制度改革+市场机会+空间集聚”是报酬递增的重要前提。从经济追赶国家的经验看，当工业化大规模扩张的动力消失时，新的报酬机会的挖掘需要借助城市化——包括城市人口集聚所引致的收入水平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速度的提升、城市人口集聚所引致的需求多样性及其对供给面质量的促进、城市人口集聚所引致的知识扩散速度的加快及其创造能力的激发等。现阶段全国性空间开发和区域开发规划，在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定位上应当围绕报酬递增机会的发掘，借助空间整合打造



创新机制。

其次，就开放而言，借助“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快速工业化阶段结束后，通过实施积极的对外合作谋求国内产业链延伸、发现新机会和参与国际竞争，是大多数追赶成功的国家倾向采取的策略。现阶段，中国工业化正处于国际能源合作、转移低端产业链的关键阶段，对外合作的进行，一方面为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腾出空间，另一方面为国内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争取时间，以便为更具创新能力的对外投资和国际竞争培育潜力。

（六）加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搭建经济社会整合平台

政府“亲资本”倾向为工业化提供了迅速的物质资本积累，在经济加速和快速追赶阶段无可厚非。但是，当长期增长过程发生了投资与消费的过度失衡，消费不足成为持续增长的阻碍时，经济社会整合就理应纳入发展议题，原因是实际消费不足与劳动力市场压抑、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不健全有关。城市化的目的是经济增长的福利分享，促使农民工进城的目的的是让年轻劳动力接受更好的职业技术教育，增强就业能力。在这种趋势下，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是培育增长潜力、缓解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路径。①规范和健全劳动力利益保护机制。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劳动力权益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及其利益保护意识的增强，民营企业部门劳资矛盾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家应当根据变化的经济环境，在资本－劳动力的博弈规则方面进行完善。②完善税收体系，探索合理的收入、财产、遗产等税收计征方法，加大低收入阶层转移支付力度。③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落实城乡保障一体化，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可持续。